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共谋：整体观照下的不可靠叙述

◎周志高[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张泽兵[江西社会科学院, 南昌 330077]

摘要:“不可靠叙述”是当今叙事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话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议和关注,主要形成了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之争,它们的理论立足点一个是从隐含作者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从而导致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论述思路。其实,完整的文学活动必然包括隐含作者、作品和读者三个重要的环节,缺一不可。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必定是隐含作者有意为之,以达到某种叙述目的和审美效果,同时,这一策略只有被读者识破时,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达成共谋,叙述效果才能达到。因此,当我们从隐含作者、文本、隐含读者三方面整体观照去理解不可靠叙述时,就能摒弃当前不可靠叙述的两种方法论所存在的瑕疵,获得对不可靠叙述的全面认识。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 方法论之争 整体观照 共谋

一、引言

在叙事学的诸多理论概念中,“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自从该理论概念在叙事学界被提出以来,一直被看做是文本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之一。如今,这个概念更已成为“当代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论题”,被叙事学家广为阐发应用,在叙事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叙事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不可靠叙述做出了迥异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对该理论研究的发展。学界对于不可靠叙述的争论,主要在于如何判定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真理不争不明,道理不讲不清,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研究中的不同声音固然是好,但若能够理清思路,达成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解共识,对于我们如何判定、欣赏叙事文本中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不可靠叙述的研究现状

不可靠叙述理论肇基于20世纪60年代初,以韦恩·布斯(Wayne Booth)的理论专著《小说修辞学》的出版为标志。在当前的西方叙事学界,该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最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两种互为对立的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由此导致西方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论争中出现了三种观点:一是大张修辞方法的旗帜。首先提到的就是不可靠叙述理论的首创者韦恩·布斯,他以隐含作者的规范作为判定不可靠叙述的标准,“将叙述者按照隐含作者的规范进行的叙述称为可靠叙述,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主要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即“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其次是里蒙·凯南、普林斯、马克·柯里、波特·阿伯特等,他们长期将布斯提出的不可靠叙述理论视为圭臬,以修辞方法来建构不可靠叙述理论。特别要提的是,布斯的坚定支持者、修辞方法的集大成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他至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布斯的理论:1.他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发展成了三大类型(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根据这三大类型,相应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事的亚类型;2.增加了区分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与作为叙述者的功能的不同作用;3.费伦比布斯更加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程度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4.费伦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疏远型”和“拉近型”的二元区分。二是认为认知方法优于修辞方法,应该用认知方法取而代之。主要代表是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和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他们认为将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联系起来的做法,使叙事理论丧失了说明不可靠性的语用效果的可能性,因此,将不可靠性视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整合机制”,更多地“关注文本的再现方式与读者在建构可能世界时的选择之间的互动性,把不可靠性置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断言“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采用“总体结构”来代替“隐含作者”,用读者的规范既替代了隐含作者的规范,也置换了文本的规范。三是认为以上两种方法各有不足

之处,应该将两者融合,采用“修辞—认知”的综合性方法。在西方叙事学界,持综合性方法之洞见来研究不可靠叙述的学者主要以安斯加·纽宁和佩尔·克罗格·汉森为代表,他们致力于打破不可靠叙述研究中两种研究方法非此即彼的局面,试图找到综合两种方法的平衡点和融合点,以期对不可靠叙述进行更好地研究。

西方学者对“不可靠叙述”的论争使该领域研究不断深入,但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安斯加·纽宁和汉森试图建构的“修辞—认知”综合性方法亦有其悖谬和尴尬之处,安斯加·纽宁的综合方法滑向了修辞的立场,而汉森的综合方法本质上却是认知的。

国内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目前仍处于一种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引入和译介。不可靠叙述理论的许多原典性著作,从早期的韦恩·布斯到后来的里蒙·凯南、普林斯·马克·柯里、詹姆斯·费伦、安斯加·纽宁等人的主要论著已经引入到国内。为了方便中国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把握,一些出版机构出版了诸多不可靠叙述理论原著的中文版,特别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未名译库出版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叙事》)的中文版等。其次是不可靠叙述已经进入公共学术视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可靠叙述已引起国内叙事学界众多学者的关注,不少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对不可靠叙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要么应用不可靠叙述理论对文本进行分析,要么对不可靠叙述理论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也有学者对詹姆斯·费伦、安斯加·纽宁等进行专门研究。同时,不可靠叙述也被应用到其他艺术形式中,如电影、音乐、绘画、传媒、电视等。最后是国内已经取得了较多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成果。不可靠叙述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国内学者从事研究,他们在西方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努力创新,取得了较多相关成果,例如申丹、赵毅衡、王丽亚、陈锡麟、尚必武等。

虽然国内学界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不可靠叙述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等的理解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基本上沿袭了西方叙事学界的方法论二分之争,对西方学界的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进行引介与评述,持经典叙事学观念的学者更多偏向修辞方法,而持后经典叙事学立场的学者则多倚重认知方法,使研究出现偏颇而有失论证理据的充足性。二是从理论层面上创新发展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不足,而应用不可靠叙述理论进行文本分析的文章颇多。在国内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研究主要是跟进西方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最新进展,西方学者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跟进到什么程度,真可谓“亦步亦趋”。总的来说,我国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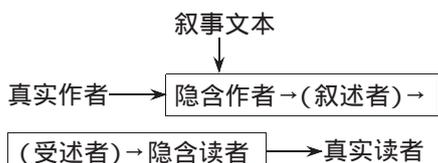
者就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研究提出的创见不多,真正在不可靠叙述理论创新发展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并能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的学者首推申丹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申丹教授在西方的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不可靠叙述的文章,展示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成果,例如,“聚焦于叙述层上不可靠的人物眼光对人物主体意识的塑造作用”,“论述从语境与文本形式结构两个方面共同去阐释不可靠叙述”,“从内文本性、外文本性和文本间性论述了不可靠叙述”。她在2009年出版了《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一书,提出了运用“叙事学与文体学互补、整体细读、互文性、潜文本”等方法去判定、阐释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2014年又提出了运用叙事文本的“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去判定、阐释不可靠叙述,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故事情节的隐性进程对不可靠叙述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超越西方学者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范式和定见,摆脱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之争的“泥沼”,从整体观照来研究不可靠叙述。

三、整体观照下的不可靠叙述

长期以来,在不可靠叙述研究领域之所以出现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之争,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理论立足点一个是从隐含作者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割裂了隐含作者、文本和隐含读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完全阻隔开来,从而导致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论述思路。这两种方法在研究中都出现偏颇而有失论证理据的充足性,其根本在于忽视了对文学活动的整体把握。要真正地把握不可靠叙述,我们必须从整体观照去理解它。文学活动的完整把握必须考虑到作者、世界、作品、读者以及这几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就很好地阐述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每一件艺术作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的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第一要素是作品。第二要素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是有一个直接或间接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况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为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从艾布拉姆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获知,他认为文学活动包括了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其实,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并不高深,贵在将文学活动的要素及其联系阐释得很清楚。作者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人,他的创作会或多或少受其所处世界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处的

世界。作者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通过作者的构思与创作,赋予了文学作品“生命”,而一旦文学作品被作者创造出来,它不能束之高阁,否则它将在尘封中“死去”。它必须与读者见面,是读者的阅读给予了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空气”,使之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因此,读者也是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美国著名的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Seymore Chatman)在他出版的专著《故事与话语》中提出的“叙事交流图”也较好地表达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密切关系的关系。



从该叙事交流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叙事作品的创造者,也是叙事交流中信息的发出者,叙事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作者构思创造的,当然也包括各种叙事技巧,而不可靠叙述策略也不例外。读者是叙事信息的接受者,但绝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根据文本信息积极进行意义建构与阐释的参与者。这时其实蕴藏着一个由读者向文本、作者探索的逆向交流。当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对文本信息进行“双重解码”: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从而判定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和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此时,隐含作者是不可靠叙述策略的发出者,读者是理想的读者,即隐含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叙述策略心领神会,隐含读者与隐含作者在叙述者背后秘密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享受“戏弄”叙述者的狂欢,看着叙述者出尽洋相,叙述者成了嘲讽的对象,从而收到很好的反讽效果。通过辨析、判定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不仅对于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人物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读者拨开话语的虚假表象、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主题意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妨拿爱伦坡的《泄密的心》来做一分析。在小说中,导致“我”杀死那位从未伤害过“我”的老人的原因不是他的金子,而是他长着一双浅蓝色的鹰眼,每当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就全身冰凉。在将老人的尸体肢解、并用一只澡盆盛好藏在地板下之后,“我”为自己做事的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而沾沾自喜,自认为没有人能够发现自己的罪行。当警察上门调查的时候,我装得若无其事,高谈阔论,请求警察细心调查。但就在这时,“我”感觉一种声音在耳朵里响起,“那是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

被棉花包裹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已经透不过气来——可警官们还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可那几个人仍然高高兴兴,有说有笑。难道他们真得没有听见?万能的主啊!——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嘲笑我的心惊胆战,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也这么认为。但是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更可容忍!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恶棍!我大声叫道,‘别再装了!我承认这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叙述者“我”在警察搜查的时候,产生了幻听,感觉自己听到了被杀死的老人的心跳,并认为警察也听到了老人的心跳,而警察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在嘲弄自己的恐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大骂警察“恶棍”、虚伪,承认了自己杀死了老人。在这里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不仅在事件报道上存在不可靠叙述,因为他不可能听到死人的心跳,而且在价值判断上也是不可靠的,他自己是虚伪的,并为自己的“狡猾”“聪明”而沾沾自喜,反过来却认为警察虚伪,故意装作没有听见老人的心跳。叙述者在事件报道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我”的叙述一直紧扣自己的“伪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伪装能力的赞叹,最终却遭到自我欣赏的伪装的惩罚。读者从而得以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塑造和作品蕴含的“善恶有报”的主题。

四、结语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言,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技巧和手法;从叙事理论层面来讲,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和研究话题;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不可靠叙述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分析工具。在判定、理解不可靠叙述时,我们要从整体观照出发,通过对文本的细读,确定文本中的叙述者,分清叙述者与感知者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分清第一人称叙述中作为“叙述的我”与“人物的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之间在事实报道、对事件的阐释和价值判断方面出现的偏差,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考察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文类、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中的不可靠叙述,从而实现运用不可靠叙述策略更好地对文本进行审美分析,揭示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意蕴。

Ansgar Nünning, "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 (下转第 167 页)

的平民化、大众化的地方儒家教育实践的自觉努力,促成儒学在地方走向制度化,最终还是在朱熹手中得以完成的。朱熹虽然较王十朋年轻十八岁,但与王十朋同朝为官,有书信往来,相互赏识,曾作《上待制王梅溪先生书》,自称“使理日益明,义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扩而充之日益远,则明公之赐,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终教之也”^⑩,所作《王梅溪文集序》对王十朋也敬赞有加,《朱子语类》提及王十朋处也是赞王十朋才识过人,具有“至诚”品性。可见,王十朋对朱熹卓有成效的地方教育实绩和教育理论构建,是有着承启之功的。

陈鼓应:《老子今译今注》,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05 页。

宋木华:《论王十朋的人才观》,《作家》2013 年第 12 期,第 152 页。

⑬⑭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62 页,第 959 页,第 956 页,第 986 页,第 57 页,第 766 页,第 766 页。

⑮⑯⑰⑱⑲⑳㉑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3 页,第 114 页,第 1 页,第 40 页,第 40 页,第 471 页,第 495 页,第 512 页,第 225 页,第 226—227 页。

⑫ 吴鹭山:《王十朋年谱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第 6 页。

⑬ (宋)王十朋:《送吴翼万库赴省试序》,《王十朋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59 页。

⑭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5 卷第 3 期,第 39 页。

⑮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56 页。

⑯ 张世欣:《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 页。

⑰ (宋)朱熹:《上待制王梅溪先生书》,《王十朋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57—1158 页。

作者:宋木华,硕士,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辑: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上接第 164 页)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P92.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159.

⑪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64 页,第 60 页。安斯加·纽宁:《重构“不可靠叙述”概念: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詹姆斯·费伦、彼得·拉比诺维茨编,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1—101 页。

Dan Shen, “Unreliability and Characterization”, *Style* 23 * (1988) pp. 300-11.

Dan Shen, “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 *JNT: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35 (2005), pp.155-57.

Dan Shen and Dejin, “Intertextuality, Extratextuality, Intertextuality: Unreliability in Autobiography vs. Fiction”, *Poetics Today*, 28.1 (2007), pp.43-87.

Dan 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P, 1978, p151.

⑫ Edgar Allan Poe *Bes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4—285 页。(文中所引为笔者所译)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不可靠叙述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编号:13WX05

作者:周志高,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叙事学、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张泽兵,博士,江西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叙事学。

编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